



哥伦布评传

[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著

朱伦译

230141

哥伦布评传

〔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著

朱伦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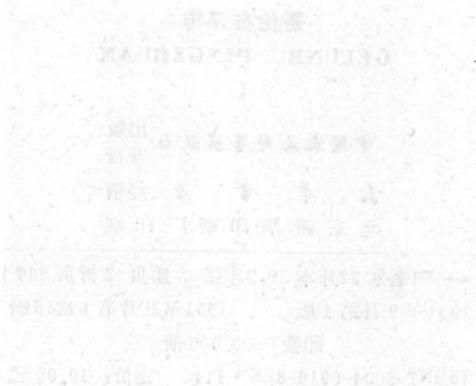
玄静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卷030 宋壹译(京)

Vida del Muy Magnífico Señor
Don Cristóbal Colón
Salvador de Madariaga
Espasa-Calpe, S.A., Madrid
Impreso en España
Depósito Legal:M.41,421—1978

根据马德里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股
份公司 1978 年西班牙文第二版译出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徐莉芳

责任校对：何君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王丹丹

哥伦布评传

GELUNBU PINGZHUAN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3插页 2折页 46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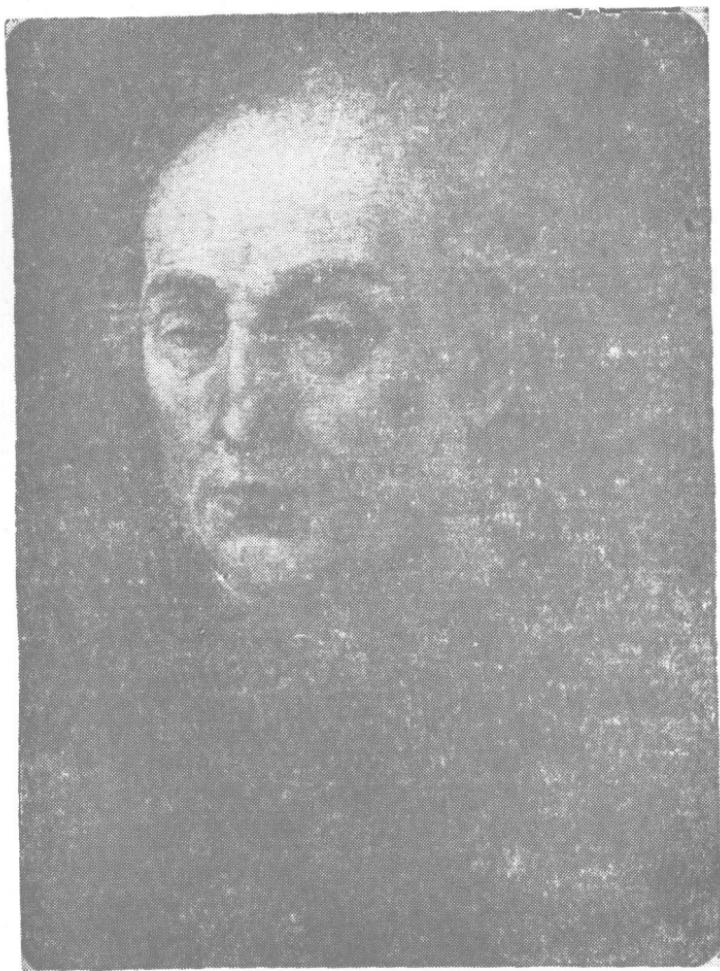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7-5004-0916-8/K·114 定价：10.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评析重于叙事的哥伦布传记。书中不仅叙述了哥伦布从生到死的全过程，同时还对哥伦布四次航行中所发生的问题与事件、哥伦布与西班牙王室及有关人物之间的关系、哥伦布的内心世界与思想变化等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和研究。以往有关哥伦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论述，作者的结论和观点有的与众不同。本书的特点是资料丰富、问题论述全面、有独到见解。



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肖像

(马德里航海博物馆)

此书出版得到“西班牙纪念美洲发现—两个世界相汇500周年全国委员会”的资助

Se edita esta obra con el apoyo de
las finanzas proveídas por la Comisión
Nacional Quinto Centenario de España
para la Conmemoración del Descubri-
miento de América-Encuentro de Dos
Mundos

作者简历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1886年7月23日生于拉科鲁尼亚，1978年12月14日在瑞士洛迦诺逝世。曾当过工程师，数年后辞去这个职业转而从事文学。事实表明，马达里亚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著名的西班牙人，是人文学家的典范：知识渊博；会多种语言；走遍世界；了解科学与人类。因此，他是一个开明宽容的人，非常尊重事实和他人。先后在马德里和法国攻读学士学位，并在法国矿业学校攻读工程师课程。1916年，作为《泰晤士报》的文学评论员移居伦敦。1921年，进入“国际联盟秘书处”，任“裁军部”领导人。1928年辞去这项职务，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任西班牙文学教授。从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起，曾任驻华盛顿大使和西班牙驻国际联盟大会的代表。他此时还被牛津大学聘为艺术讲师。1936年，被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语言学院院士。1973年，被授予最令人尊敬的卡洛马尼奥奖；如同这个崇高的荣誉所表明的那样，以表彰他为欧洲献身的一生，为勇敢捍卫自由和伦理而奋斗的一生。为了了解唐·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思想和感情，在他的令人尊敬和勤勤恳恳的一生中，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论他的出身是克尔特人，而他的家乡又是西班牙，可是他的心灵是属于欧洲的。他以令人钦佩的才能留下了各种作品：报道、诗歌、小说、剧本、论文、旅行记、历史、传记和自传。作为这些世界上最严谨的出版物的撰写人，马达里亚加是一名敏锐深刻的

作者。关于他的大量著作，此处可举出他的权威性著作《西班牙现代史论》；其他有如：《阿塞瓦尔与英国人》、《西班牙妇女》、《盎格鲁-西班牙论文集》、《〈唐·吉诃德〉读者指南》、多集小说《埃斯基维尔和曼里克》；他写的有关美洲的征服者和解放者的大部头传记有：《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他的范本《埃尔南·科尔特斯》、两卷本传记《玻利瓦尔》；此外，还有《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兴衰》一书，以及自己的两卷本回忆录《没有中午的白天》（1921—1936年）；这部回忆录的出版，是一件伟大的文化事件。在传记方面，还有此处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巨著《极其杰出的唐·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先生生平》。马达里亚加在这部著作中参考了大量的书目和资料，文笔风趣流畅，完全是个人思考的结果；作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能力分析了哥伦布本人的大量书信，试图把握哥伦布的潜意识，且几乎达到了思想对质的地步。马达里亚加饱览了有关哥伦布、平松、伊萨贝尔和费尔南多、日本和契丹的著作，得出了令人激动的成果。作者以格拉纳达战役为序言，然后便转入发现者的模糊身世问题：哥伦布是卡斯蒂利亚人，还是热那亚人、犹太人？或者兼而是之？马达里亚加详细地分析了各种可能性，用自己心中的筛子对它们加以筛选，最后直接指出了哥伦布具有极为复杂的身份这个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接着，作者向我们依次论述了15世纪末的西班牙：格拉纳达战争、宗教冲突、犹太人问题、宗教裁判所的建立；与此同时，着重介绍了哥伦布在葡萄牙受挫、寄希望于西班牙的过程，把哥伦布比作不成熟的并到处瞎撞乱碰的唐·吉诃德。最后，论述了哥伦布的第一次远航、发现陆地的伟绩；接着就是哥伦布的野心、失败、死亡和幻想的破灭。面对马达里亚加的这部可能是最激动人心和学术性最强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激情和学术水平；而且，这部著作还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读物；但最重要的，它是使人

们了解美洲的伟大发现者的最有价值和最有权威的著作。

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股份公司出版的马达里亚加的其他著作有：

《西班牙现代史论》(España: ensayo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回忆录》(Memorias, 1921—1936年)

《从苦难走向自由，一个联邦主义者的回忆》(De la angustia a la libertad. Memorias de un federalista)

《玻利瓦尔》(Bolívar, 两卷本)

《埃尔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

《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兴衰》(El auge y el ocaso del 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ca)

《绿宝石心》(El corazón de piedra verde, 包括三卷；幽灵、残忍的上帝、没有诅咒的信仰)

《流血的战争·时代的血滴》(Guerra en la sangre. Una gota de tiempo, 《埃斯基维尔和曼里克》小说集之二、之三，之一是《绿宝石心》)

《黑人种子·萨塔纳尔》(El semental negro. Satanael, 《埃斯基维尔和曼里克》小说集末集)

《西班牙妇女》(Mujeres españolas, 南方丛书, 第1500号)

《阿塞瓦尔与英国人》(Arceval y los ingleses, 南方丛书, 第1538号)

《〈唐·吉诃德〉读者指南》(Guía del lector del «Quijote», 南方丛书, 第14号)

即将出版的有：

《世事与人》(Cosas y gentes, 两卷本)

《一个坚定者的画像》(Retrato de un hombre de pie, 南方丛书)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著作 《哥伦布评传》中文版序言

——应“西班牙纪念美洲发现—两个世界
相汇500周年全国委员会”之托而作

1555年，在欧洲首次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华王国”的见闻录，它们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这些见闻录不是描写那些欧洲商人历尽艰辛到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而是着眼于用翔实可信的材料，来替代沿陆路经东欧旅行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所著《奇闻趣谈》(Libro de las maravillas)一书中已失去魅力的虚构报道，以及西班牙使者鲁伊·冈萨雷斯·德·克拉维霍的报道。正如萨那教授*在1990年智利圣地亚哥“第二届500周年正式委员会国际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促使哥伦布远航的动机之一是中华文化的影响”。的确，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15世纪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不了解，这样的双重原因构成了哥伦布决定西航前往中国的动力之一。

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在哥伦布之后不久就直接建立起来了。前文所说的1555年，两名耶稣会教徒——埃尔南·门德斯和梅尔乔·努涅斯，分别从马六甲和澳门用葡萄牙文（很快被译成西班牙文）报道了有关中国的综合消息。这些消息是他们从交谈者那里听到的，这些人从南线航路来到了马六甲和澳门，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译者注

他们对中国内陆事物有所了解。这些人在中国的停留时间虽说不太长也不太舒服(埃尔南证明说他们被关押了6年,先后被转移到不同的监狱和城市),但是却得到了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耶稣会教团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便利了一些文稿的出版和发行;实际上,这些文稿都是写给教团上层人物的信函,通过立即印刷,其他耶稣会教士便更好更多地了解了情况。因此,这批材料才得以留传下来,并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如同那些在欧洲首批出版的有关“中华王国”的见闻录一样,这些出自耶稣会教徒之手的文稿,今日已成为人们研究中国-欧洲文化交往的一些主要文献。

这些简短的文稿除了讲到其他一些事物外,还对北京进行了迷人的描写,说北京是一个巨大而封闭的城市,是皇帝(这些旅行家称之为国王)居住的豪华禁地,皇帝“到死不离开那里”。这些文稿还谈到了“建在中华王国边界上的一些令人惊叹的城堡围墙”,*说这些围墙穿山越岭,是抵御“那些勇猛善战的鞑靼人”的防卫工事。

但是,这些作者用更多的笔墨赞扬了中华人民,特别突出地介绍了中华人民的聪明才智。梅尔乔·努涅斯写道:“他们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具有制作手工制品的特殊天资,依我看没有哪个民族能与他们相比”。

对于那些来自16世纪中叶动荡的欧洲世界的人来说,和平无疑是他们非常尊崇的价值。因此,他们对自己隐约了解到的中国的帝制很赞赏。还是梅尔乔·努涅斯,对中国的帝制作了如下描述:“这些人们很讲和平,以致于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争吵和纠纷;无论是在统治人们的统治者中间,还是在被统治者中间,情况都是如此。”至于埃尔南·门德斯,虽然他的分析不同一般,但

* 指中国的长城。——译者注

他的结论是很鲁莽的；他就中国帝制所发表的见解与他的描述大相径庭，他竟把上述现象归功于统治制度的优越。

按照门德斯的观点，帝制具有“大公一统”的特点，它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和公道的。门德斯很赞赏帝制的贵族特征：“国王周围有一批非常博学明智的贤才，国王与他们一道处理王国的一切事务”，甚至愿同他们一起及时总结自己的政事。

门德斯还说，比上述这一点更重要的特点，是帝制重视一种超越时间并有益于任何政体的生命价值，即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不判死刑”。这些描写定会像钟声一样在16世纪的欧洲社会产生回响，因为当时的欧洲正苦于寻找审美灵感来对待犯人，以使那些成千上万的囚徒和死刑犯能更好地度过临终的苦难。

不管怎么说，欧洲正是从1555年开始直接认识中国的。在63年以前的1492年，被那两位西班牙国王任命为海军上将的哥伦布指挥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从而给欧洲人带来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奇迹，使欧洲人知道了一块他们从不知道的从北极绵延到南极的大陆，并使欧洲人实现了几个世纪的愿望：得到了有关亚洲世界的直接的和现实的消息。而在此之前，亚洲只是欧洲人梦幻中的、想象中的和虚构中的亚洲，然而，就是这样的亚洲概念，最后也被遗忘在一些少而陈旧的报道迷雾之中了。

毫无疑问，当哥伦布起锚进行第一次远航时，欧洲人的知识状况就是如此。从西班牙当时的先知式知识贵族为海军上将准备的以供他到时选用的外交文书中看，欧洲人的知识状况也是这样。这些文书是写给哥伦布在航途中可能遇到的君主或王侯的，文书对哥伦布可能到达的地方的种族、宗教、法律和风土人情没有任何确切的了解，这样就迫使撰写人不得不作出各种想象性的假设。

哥伦布后来找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暂且不说，但我们今天应当记住这样的事实：哥伦布当初要找的人们正是亚洲大陆的人们，

并且他还断然肯定他已找到了。哥伦布一直固执己见，认为他所找到的那片新土地是印度。由此，在很长时间里，美洲被叫做“印度”，那里的人们被叫做“印度人”*。除了这个奇妙结果以外，哥伦布的发现还引出了另外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美洲的正确命名。罗伯特·莱维利尔写道：“称这块新土地叫亚美利加洲是名正言顺的”；他正确地解释说，面对哥伦布的否认，是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第一个看出了海军上将找到的那块大陆是一片新土地。

第二个结果是为欧亚两洲之间的直接了解创造了条件。这正是海军上将所期望的，也正是海军上将多次重申他已做到的。他是如此强烈地肯定这一点，以致于他在观念上忽视了自己的四次远航所带来的其他一些同样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但是，正是哥伦布的开拓性的远航，才使现在纪念他远航500周年这件事有了自身意义（不是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必然交流）；哥伦布当初是想到中国去的，处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讲到亚洲时，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

哥伦布提供了打开空间隔离、打开联系道路的钥匙。他不仅开辟了在加勒比小岛瓜纳哈尼登陆的航路，而且还开辟了返回欧洲的航路。研究哥伦布的大专家胡安·曼萨诺认为，哥伦布的成功离不开下述两个条件：一是他曾经听到有人讲到过现已失传的“先期发现”故事，这给他指明了来回航线；二是他得到了安达卢西亚航海家族平松兄弟们的杰出合作，因为平松兄弟在来回途中都向哥伦布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和坚定的支持。如果说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这倒使我们想起了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

* “indiano”一词在西班牙文中有两个意义，一是印度人，一是美洲土著居民。当指美洲土著居民时，中文音译为“印第安人”。但在此处，根据作者的行文意思，故译为“印度人”，但实际指的是美洲土著居民。——译者注

加塞特在给“个人”这个概念下定义时所写的一句话；他说，个人“就是我，就是我与我的情况”。因此，先期发现故事以及平松兄弟们的合作，就成了哥伦布这个“我”的情况。没有这些情况，海军上将就不可想象；而这些情况，也不可能脱离海军上将，更不能抹煞他。

既然哥伦布的形象是这种复杂的整合面貌，我们就应当肯定地说，是500年前的哥伦布使欧洲人开始出现在中国并使了解中国成了可能；使上面所谈到的那两位耶稣会教徒在1555年用信函的形式向其他人介绍中国成了可能。这就是说，1492年哥伦布的远航，为欧亚两洲之间后来的相互了解创造了客观条件。

正是由于美洲的发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才有了最大的可能性。在西属菲律宾群岛，人们用“中国之船”这个术语来指称自16世纪末开始定期经常航行在太平洋最早的商路线上，以便把亚洲的产品和手工制品运往西属美洲的大帆船，这就是这种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一个象征，而且不仅限于是个象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到威廉·利特尔·舒尔茨的出色研究。威廉的研究既涉及到西班牙试图从马尼拉向中国大陆沿海、台湾甚至印尼等地的发展，也涉及到因中国丝绸贸易导致马尼拉城诞生的具体事实。当时，中国丝绸是马尼拉或菲律宾大帆船所运货物中的基本的手工制品；马尼拉大帆船或菲律宾大帆船是在美洲的叫法，而在马尼拉或菲律宾那片群岛，则是以“中国之船”而闻名的。

向埃尔南·门德斯讲述中国情况的那位无名氏，也注意到了“在那个王国生产许多丝绸”。中国丝绸，导致了马尼拉城的诞生。如同罗德里戈·德·比维罗和加夫列尔·德·圣安东尼奥在讲到日本和柬埔寨历史时所说的那样，马尼拉不仅是一个冷清的商品仓库和战略要地，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跳板。

遗憾的是，1575年想通过互派特命全权大使来建立中西两国诚挚关系的良好愿望，由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吉多·拉维萨雷斯被不适当的撤换而未能实现；新任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断送了他的前任总督的外交成果，他愚蠢地试图去征服中国，他的这个想法立即被西班牙王室否决了。

1555年向前述两位耶稣会教徒讲述中国见闻的那位无名氏，十分正确地预见了中西之间的交流将来会有更多的作为（“将会日益发现更多的东西”）。当时，人们对交流这种形式的理解是不成熟的，但却触及到了那些当时无法预见的方面。这位无名氏仅仅叙述了所见所闻中的主要东西，而把其他大部分事物“留给时间去发现”。这里我不想对当时才开始而后又延续数百年的这种交往关系进行简要的回顾，但如果想对这种交往关系的各种环节进行一下描绘的话，我们就应提到那些伟大的和深思熟虑的基本改革计划；就应提到后来西班牙在开拓古巴时所采取的大规模输入中国劳工的措施；就应提到直到20世纪初仍然表现在马德里人民身上的那种自发的民间文化的下意识心理，即认为“中国服装”是女式服装中最好的式样。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证据来说明中西之间的交往关系：例如，由埃斯特万于1640年在马德里写下的有关他的父亲——比利时裔西班牙人雅克·德·考特雷的《亚洲旅行记》，就是这些证明之一。

曾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主演过具有革命性业绩的哥伦布，其身世到底如何，许多作者为了解开这个谜底花费了无数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到那些作者的名字，甚至连主要作者的名字也不能全都提到。巴斯特列举了一些代表性人物，他们是：莫里逊、塔维亚尼、鲁梅乌·德·阿马斯、门嫩德斯·皮达尔、莫拉莱斯·帕德龙、埃尔南德斯·桑切斯-巴尔巴、西奥拉内斯库、巴列斯特罗斯·贝雷塔、维格诺德、莫利纳里、哈里斯、康苏埃

洛·巴雷拉、米尔胡、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亚兰斯、埃尔南德斯。迪亚斯……所有这些人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人物，个个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是，从更高的学术水平来说，人们普遍赞同和默认的人物，毫无疑问应该是胡安·曼萨诺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二人；前者擅长哥伦布档案研究，后者是出类拔萃的文笔优美、治学严谨的哥伦布传记作者。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达里亚加可与玛丽·雷诺特、罗伯特·格雷夫斯、戈雷·比达尔或马格里特·约塞纳这些作者相媲美。这些作者对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知识具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们得以写出了有关亚历杭德罗·马格诺、克劳迪奥皇帝、胡利亚诺皇帝、安德里亚诺皇帝的真实可信的小传，或者说为他们描绘出了不同于其他人物的形象。例如，约塞纳在他的著作《黑人塞诺·德·奥普斯传》(Zenon de Opus nigrum)中，就把帕拉塞尔索、塞维特、莱昂纳多和坎帕内利亚等人的特征结合起来，塑造成了一个人物形象。由于马达里亚加像这些作者一样熟悉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这就使他能够在这部《哥伦布评传》中对哥伦布本人、以及他的同代人、他的国王们、他的同事、他的对手和他的家庭从心理学上进行深刻地分析，这些分析是建立在哥伦布的语言风格和史料这两个确定的基础上的，是可信的。

特别是马达里亚加对海员们在发现瓜纳哈尼岛前夜时的兴奋、激动、痛苦及希望的心情所进行的描写，有可能是一些光辉永存的篇页。瓜纳哈尼岛的发现，最终向世人展示了那片后来称为美洲的不为人知和令人惊奇的土地。对于那些作为证人和被动一方的印第安人在首次遇到那群大西洋来客时可能流露出的惊奇、错觉和害怕，马达里亚加的描写同样是精彩的。这群大西洋来客突然地闯入了印第安人的世界，但后来他们又把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家园里抓送到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狭小的、陌生的甚至是